



博士论丛

左大培 著

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



- 要 ● 弗赖堡学派的基本特征
目 ● 历史与哲学
目 ● 瓦尔特·欧肯的经济学方法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博士论丛

弗赖堡经济学派 研究

左大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

左大培 著

责任编辑：姚莎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 印张：10 字数：20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7-5355-0559-7/G·554

定价：3.40元

总 序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批学有功力、才华溢横、富于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正脱颖而出。他们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其成就为中外学人所瞩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国内外的博士学位。为了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有选择地、但又不拘一格地编辑出版这套《博士论丛》，专门用以印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有关毗邻、交叉学科范围内的优秀博士论文或水平相当的著作。

当今知识更新之高论邀宠，信息爆炸之危言耸听，我却淡然于好新惊奇，无意于时髦文化的追求，这并非藐视各种新的尝试，实为强调学术根基之坚实。那些踏踏实实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心领神会于存在之整体的作者，才是我们最珍视的力量。我们惟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真正的学术，决非图一时一地之热闹，而需求有恒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研习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而要能通古今历史之至变，究人生社会之真义，启迪读者之心扉；治理学术，则不限于述评、比较，要在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

之本源，与各民族宗师哲人交流。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与洋人、后人对话，而且不断提高对话的层次，就学术的进步来说，这是使我国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创新而不止于移花接木，引进而不孜孜于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没有多年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决不能达到的。但愿《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与我们一起，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相信，不屑于赶时髦、凑热闹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五四”运动后，也是一批青年人起而顺应世界文明大势，以新的眼光整理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奠了基，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学贯中西而又自成一说的名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西文化再次相遇和撞击，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创造性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此大发展中必将发挥其中坚作用。我们有理由期望，《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中也会涌现出不逊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者。

《博士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7年7月于北京

《博士论丛》编委会

主 编 叶秀山

副主编 周国平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宁

王友琴

王润生

刘 东

苏 斌

何怀宏

张维平

姚莎莎

韩小蓀

目 录

导言——弗赖堡学派的基本特征	(1)
“第三条道路”	(1)
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	(4)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5)
天主教社会学	(6)
社会民主主义	(7)
竞争的社会主义	(8)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10)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个集团	(10)
“真正的”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	(13)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15)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	(17)
弗赖堡学派的基本观点	(20)

秩序和“奥尔多”(Ordo).....	(24)
实际存在的、实证性的各种“经济秩序”	(25)
奥尔多,或规范性的“经济的秩序”	(26)
第一篇 历史与哲学	(31)
1 弗赖堡学派的主要思想支柱	(32)
弗赖堡学派的三个思想支柱	(32)
“秩序”观念	(33)
个人主义	(38)
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	(44)
自由人的法治社会:个人主义与秩序观念相融合 的历史契机	(48)
古希腊罗马时代:自然主义、个人主义和秩序观念的萌 芽	(50)
中世纪:秩序观念最终成型	(57)
近代:自然秩序观和自由主义	(62)
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68)
2 弗赖堡学派:资本主义竞争危机的产物	(72)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弗赖堡学派的 酝酿期	(76)
1933—1945年:弗赖堡学派的形成	(87)
1945年以后:弗赖堡学派的成熟期	(96)
3 弗赖堡学派的经济社会哲学	(107)
从孤立个人出发的资源配置机制:经济活动的必 要前提	(107)
资源配置:经济过程的主要问题	(108)
资源配置机制:任何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	(110)
孤立的个人:考察资源配置机制的出发点	(111)

均衡中的自由：弗赖堡学派的价值观	(113)
作为最高的价值的个人自由	(113)
权力集中：社会中对自由的威胁	(116)
均衡：在社会中普遍实现自由	(117)
反宿命论：反历史主义的一个方面	(119)
否定“经济阶段”和“经济风格”	(120)
否定经济发展观念和动态经济理论	(121)
否认历史的必然性	(122)
反对所谓“一般概念的人格化”	(123)
不同生活领域本身的绝对规律性——反对相对主义	(125)
经济学的任务：客观地认识经济现实	(125)
承认每个生活领域自己特有的规律性	(127)
真理的绝对性	(129)
以价值为目的，综合分析出特有的规律性	(131)
社会科学的任务	(132)
认识经济现实的过程：先分析，后综合	(133)
以价值为目的的综合	(136)
第二篇 瓦尔特·欧肯的国民经济学方法论	(139)
4 欧肯关于“形态学体系”的学说	(141)
欧肯的“形态学体系”	(141)
属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秩序形式	(144)
属于“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	(146)
与现实类型不同的理想类型：欧肯的经济秩序形式的根本特征	(154)
欧肯的“形态学体系”的根本特征	(164)
计划体制和资料体制：决策结构和信息结构	(164)

资源配置机制的构成要素	(169)
从计划体制出发, 严格区分竞争与垄断	(170)
部分垄断与部分寡头垄断独立化为供给与需求的纯粹形 式	(175)
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研究市场形式	(176)
高度评价对货币制度的理想型研究	(178)
欧肯的经济秩序形式的来源	(180)
5 欧肯有关提炼理论原理的方法论	(190)
经济理论: 定义、功能和逻辑性质	(190)
《资本理论研究》中的理论研究之路	(198)
普遍性的问题与适用于个别经济形式的特殊解答	(202)
“资料”	(211)
经验规则与风险	(218)
欧肯的理论分析方法	(225)
6 欧肯的经济研究方法体系	(237)
欧肯的经济研究方法体系概述	(238)
经济学的困境	(249)
欧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263)
“着重强调的抽象”——欧肯与历史学派研究方法 的根本区别	(272)
欧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来源	(282)
参考文献	(289)

导 言——弗赖堡学派的基本特征

□“第三条道路”

经济学中的德国弗赖堡学派^①属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又是50年代鼓吹“第三条道路”的许多流派之一，这些流派都想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这两极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它们都企图基本上保持个人在消费选择和其它经济活动上的自由，同时又对这种自由加以某种限制，以避免自由放任所带来的弊端。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中占着统治地位。这时的西方国家普遍执行所谓“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私有制、市场机制和对于“利益的自然和谐”的信心，它的口号则

^①请读者注意：经济学中的德国弗赖堡学派与哲学中的德国弗赖堡学派没有关系；二者活动于不同的时代，哲学观点也不同。

是“听之任之”，也就是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少干预市场经济过程，尽量保存市场的自行调节机制。但是，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走向了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主张建立一种集中统一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某些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圣西门的这一主张。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也吸收了圣西门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一设想。这种关于集中统一计划的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如鲁道夫·希尔弗丁等人广泛传播，终于在20世纪初变成了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建立了这样一种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由国家的中央管理机构来严格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过程。

但是，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战线上激烈交锋之时，某些西方思想家就提出，经济和社会体制上的这两个极端都不能为所有人实现正义和自由。因此他们主张寻找一条更为妥当的中间道路。这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便是“第三条道路”的最初探索者。他们的主张又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要求在某些部门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又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保存很大比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继续保留市场经济的统治地位。属于这一类的有：路易·勃朗主张国家用信用贷款建立社会工场以实现“劳动权”，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们主张扩大地方自治体对公用事业的所有权，实行“市政社会主义”，而德国的某些“讲坛社会主义者”，如瓦格纳、施穆勒则鼓吹“国家

社会主义”，由国家经营若干公用事业，管制社会经济，限制私有经济的力量。另一类的中间道路方案则主张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只由国家或某些其它社会组织来干预市场经济，限制自由竞争，避免出现自由放任的弊端。这一类中间道路的探索者包括西斯蒙第、约翰·格雷、蒲鲁东、威廉·莫里斯、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鲁·布伦坦诺、德国记者和历史学家瑞尔（W.H.Riehl）、法国工程师和社会学家披里，甚至教皇利奥十三世。这类人的方案差别极大，有的主张由国家，有的主张由银行，有的主张靠卡特尔，有的主张靠某种类型的家庭来限制自由竞争，以避免自由放任的恶果。但是在这些“第三条道路”的最初探索者中，只有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其它方案大多还只是乌托邦。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经济长期不景气，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破产了。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时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上又有许多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病。于是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势头在这些年里急剧增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为充分就业政策辩护的一整套经济理论；英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切斯特顿、历史学家和作家白洛克、教皇庇护十一世、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腊特瑙，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改革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还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如弗·奥本海默。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德、美、英的一批经济学家进一步阐发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和哲学意义，逐步形成了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经

济思想流派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某些过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势力（如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些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都在寻找自己的经济上的“第三条道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在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央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经济上的“第三条道路”含义不同。但就二者都试图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这一点来说，二者又同属广义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张经济上的“第三条道路”的各流派已经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支配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

在西方国家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各种经济思想流派，可以大体分为下述五类：

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保证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当作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同时主张使生产率极大化。但是他们主张的生产率极大化意味着尽可能满足每个人的消费欲望，以消费选择自由为前提，从属于保证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最高目的。

为保证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为此他们主张尽可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展真正的自由竞争，以便消除反社会的私人垄断，防止危害自由的集中的经济

控制，实现生产率最大化。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真正的竞争的基础上，才能按自由的精神解决社会问题。

在经济理论上，新自由主义者们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向，注重研究微观经济学，拒绝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理论。他们坚持边际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并把微观经济理论从研究市场经济中的价格问题扩大到研究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的人的选择和行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当作与保证个人经济自由同样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它因此要求使国民收入始终保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实际政策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是在市场经济中使产量与就业稳定于高水平上。为此他们主张混合经济，将私有制、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相结合。他们不象新自由主义者那样乐观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主张将价格机制与国家的控制措施结合起来，通过金融政策、国家支出和税收来控制社会总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分析重点和主要成就在于所谓“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其经济理论的代表作，该书开创了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所谓“总量分析”，阐发了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论证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他的这个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政策不能自动保证充分就业，为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被称为经济学中的“凯

恩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经济学曾经风靡一时，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作为它的代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它的经济政策主张。

天主教社会学

天主教社会学的思想基础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一世的两个通谕。50年代天主教社会学在大部分或相当大一部分居民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影响很大。在德语国家中，它的代表是奥地利人约翰纳斯·麦斯那，德国人布鲁诺·格鲁伯和内尔一布鲁宁。

天主教社会学的经济理论实际上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思辩的推论。它不是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通过分析而认识其中的联系和人们的行为规律，而是把“上帝的启示”、“自然法”当作“认识的源泉”，以天主教的道德规范来评价经济现象，并直接从所谓道德规律中引出对某些经济事实（如工资水平）的规定。它的着眼点是“医治人的灵魂”。但又接受了西方正统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论”和“企业主工资论”。

天主教社会学从天主教的道德规范中引伸出“公共福利”概念，把它作为一切经济的基本要求。它的原则是实现所谓自然的社会经济结构，靠这种结构来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这个结构要求社会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具有一种本来的相互适应、相互约束的关系。它以“自然法”来为私有制和“适当的”不平等辩护，要求工人和资本家为

普遍的福利而合作。天主教社会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只在于雇佣劳动造成了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使工人丧失了真正的主体地位。为了医治这种弊病，它主张在近期内让企业职工参与企业决策，通过小额股票参与资本；在长期中逐步实行“职业等级秩序”，使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全体成员组成一个个自治的公共团体，以消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实际上，30年代的意大利和奥地利法西斯政府都实行过它的这一主张。

社会民主主义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欧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没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他们几乎接受了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不过有时也试图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学综合起来。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点只在于利用这些理论来为自己主张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服务。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主张维护经济自由的同时，把平等和社会正义当作与自由同样重要的原则。他们还常常声称，他们代表劳动人民和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会使市场不能在稳定、公正、福利、安全等方面充分起作用。因此他们主张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行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在私有制和私人企业经营的基础上，